

北镇势力与
北朝政治文化

苏小华
著



北镇势力与 北朝政治文化

苏小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镇势力与北朝政治文化 / 苏小华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161 - 1561 - 9

I. ①北… II. ①苏…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北朝时代 IV. ①K239. 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577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特约编辑 王秀臣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吕 宏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 文 域 名 :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291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北魏后期的北镇社会	(5)
第一节 六镇社会的特点	(5)
第二节 北镇武人与中原谋士	(31)
第三节 尔朱氏集团初探	(36)
第二章 霸主与北魏皇权	(57)
第一节 尔朱荣与孝庄政权	(57)
第二节 北魏孝武帝与东西魏分裂	(80)
第三章 多重对立的东魏北齐政局	(97)
第一节 论高欢的驾驭群豪	(98)
第二节 乾明政变与北齐前期政局	(109)
第三节 两都体制与东魏北齐政治	(118)
第四章 西魏北周的政治文化初探	(146)
第一节 “内先协和”与关中本位政策	(147)
第二节 西魏北周政权中的关陇山东南朝势力	(159)
第三节 西魏北周军队的构成	(182)

第五章 勋贵与隋朝政局	(201)
第一节 《隋书》所记杨坚史事辨析	(201)
第二节 李密家族史补证	(212)
第三节 杨玄感·李密·李渊 ——勋贵在隋朝的嬗变及叛乱	(221)
本书总结	(238)
附录一 西魏北周的财政与政治	(240)
附录二 试论骑兵战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发展	(250)
附录三 传世本《李密墓志铭》与出土《李密墓铭》的先后 关系辨证	(266)
附录四 从政治制度到政治文化	(272)
参考文献	(280)
后记	(290)

导　　言

本书是由五组相对独立的专题构成的。最初的一篇是关于孝庄政权兴亡的思考。当时正在关注北魏宗室的演变，注意到宗室在北魏末年的分裂趋势，于是就从孝庄朝廷着手研究。在完成孝庄政权的研究之后，与之紧密相关的尔朱家族就成了下一个思考对象。之后，孝武政权与高欢的关系以及与关陇政权建立的关系的研究，又引出了对西魏北周、东魏北齐政治文化的思考。由于学界对这两个问题研究比较充分，所以转而研究了北镇社会。在初步理清了北镇社会的几个特征后，感觉对北齐、北周、隋、初唐史有了新的认识，于是就北镇人物在东西政权中的影响作了一些工作。所以本书上起北镇起义下至隋末唐初，而这一段正好是北朝从一个统一政权经过分裂再走向统一的历程，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有探讨的价值。^①

对于这一段历史，前人的成果还是比较丰富的。在隋朝，著名的文学家卢思道写作了《周齐兴亡论》探讨北齐北周灭亡的原因。由于隋朝与北周的继承关系卢思道的分析显得敷衍，但是对于北齐的分析今天看来仍有其价值。在唐初，官方组织了对《北齐书》、《周书》、《隋书》的编撰。这些史书不仅是史料，而且反映了编者对当时历史的认识，如果仔细推求这些书的体例以及史臣的感言，对于认识这段历史是有帮助的。在宋代，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对宋以前历史的研究性论著。对于北魏至隋朝史而言，司马光的梳理使得纷乱的历史有了头绪，当然这是司马光的思路。胡三省的注解显示了他对于制度、地理的精

^① 本节关于学术史的回顾只是言其大概，主要言及对于本文产生重要启发或本人认为重要的研究。对于本节涉及的专著、论文一律不出注，如有需要请翻阅《参考文献》。

熟，其针对事件所发的议论往往有启发意义。宋代的学者还要提到叶适，他对此段历史的议论也独具慧眼。清代学者对于此段历史的成果主要反映在考据上。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等对于正史有所考校，对于一些历史问题有所归纳、阐发。这些研究虽然孤立、琐细，但是治学方法比较系统严密，比之前代学者的议论，更为科学。对于本书有借鉴意义的研究是沈垚的《北镇考》、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程树德《九朝律考》的相关研究。清代学者对于相关资料也做了初步整理。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王昶的《金石萃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证》今天都成为研究者必备的资料书。万斯同、吴廷燮所做的史表、卢文弨的《〈魏书·礼志〉校录》、陈毅的《〈魏书·官氏志〉考证》都是有用的工作。

清末至 1949 年之前，是西方的史学进入中国，是现代史学建立、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一批史学大师，将中国史学推向了一个高峰。就此段史学而言，最早进行的研究可能是谷霁光关于府兵制的研究。此后周一良就北朝的民族关系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还就北朝的镇戍制度、六州都督进行了考释，这些研究都堪称经典。对于此段历史作出划时代成就的当属陈寅恪，他的隋唐制度的三源说、关陇集团说、种族与文化的关系说、南朝化说，是富有创见、富有启发性的规律总结。即使到今天，陈的学说仍然是学界讨论的重点和起点。1949 年之后至 1980 年之间，中国大陆的史学研究受到政治的影响，就这段历史而言北镇起义史就成为了重点。现在看来作出突出成就的，还是在 1949 年前受到良好训练的史学家。比如说，姚薇元出版了专著《北朝胡姓考》，这部书是在陈寅恪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是对这一问题最权威的论著。唐长孺在北魏末年起义的研究方面将起义分为北镇、山胡勋勒、城民三个部分去探讨，注意起义者的身份地位就显得有创见。马长寿在 1962 年出版《北狄与匈奴》一书，在此书中他分析了关陇部族的构成、分布及社会特征。在同年出版的《乌桓与鲜卑》中研究了北镇鲜卑南迁与汉化的历程。这些研究与唐长孺的《魏晋杂胡考》一样成为研究北朝史的重要参考文献。在此期间，王仲荦完成了《北周地理志》和《北周六典》，这两部作品分门别类将相关资料汇集在一起，便

于研究者使用，而且王仲荦在两书中对于某些问题进行了专题的研究，值得参考。此期间，张泽咸等完成了《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的编纂，对于本书的研究而言此书方便好用，显示了很大的工具价值。韩国磐对于北朝经济的研究，特别是均田制、三长制的研究也是本书重要的参考。此期学界还完成了由何兹全参与的《资治通鉴》和唐长孺对《魏书》、《北齐书》、《周书》以及陈仲安对《北史》的点校工作，为北朝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版本。1980年之后，历史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闹，研究成果之多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在如此众多的成果中，首先要提出田余庆的贡献。（1），他提出北朝主流论。这个观点与南朝化一起成为当今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关注点。（2），田余庆培养的学生主要在北朝史方面。比如，李凭对北魏前期政治史的研究，何德章对北朝的胡汉问题的研究，王军对北魏后期社会阶层的分析，陈爽对北朝豪族的研究，以及近年阎步克对北朝官阶的研究，阎步克还对北朝主流论进行了官阶方面的实证。（3），田余庆对北魏前史进行了挖掘，提出了有创见的观点。其次，黄永年的研究值得注意。黄永年的论文大多是与陈寅恪、缪钺等的商榷之作，他提出了文武分立在政治上的进步性，这对纠缠于胡汉问题的北朝研究来说是一个提高。再次，宿白以及张乃翥、韩玉玲对于鲜卑墓葬形式发掘器物的研究显示洛阳的鲜卑贵族仍然保留了鲜卑族的风俗习惯，这对学界普遍认可的完全汉化是一个纠正。正如张国安以及本书所论北镇也不是完全鲜卑化的区域，汉化也是一个方面。当然不能就此认为洛阳与北镇的社会形态是一样的，北镇保留部族社会的特征多，洛阳汉化的程度高。在北魏后期实际上洛阳的宗室和八姓中的部分贵族（比如穆、陆二家）已经相当的文弱化了。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对于北镇至唐初史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时段来研究，在这方面日本学者谷川道雄是第一个，《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旨在探讨隋唐帝国的形成方式。在这部著作中谷川对武川镇的研究，对于隋朝政治模式的研究是有创见的，但是他过于强调“共同体”理论，也过于重视日本学界解释六朝史的名词，所以经常偏离主题，影响了论证。中国台湾学者毛汉光对北朝核心区域的研究，对于府兵制的研究可备一家之言。他所提出的士族的中央化说，是一个创见。郑钦仁在研究北魏官制中，注意到鲜卑统治者对汉族官僚的监视，这对

重新认识北魏的胡汉问题是有启发的。韩国学者朴汉济提出了“胡汉体制”论也备一家之言。

既然研究成果已经如此丰富，那么本书的写作有何必要呢？以北镇人物为线索研究北朝后期史的有马长寿和熊德基。他们都是从北镇鲜卑的汉化方面去考虑的。这无疑是一个好的思路，但也并不是没有别的思路。本书虽然也是以北镇人物为论文线索，但是首先对北镇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北镇社会是一个鲜卑化与汉化并存的社会，北镇在军事方面的传承与发扬有丰富具体的内容，北镇是一个移民社会，在人际关系方面有不同于中原的特点。以这些具体的内容去分析北朝后期史，必然会产生新的认识。在具体的研究方面，本书力图提出新的视角，比如在尔朱集团的研究中，注意孝文帝迁都对尔朱家族的意义，注意尔朱家族在人才上的缺陷；研究孝庄帝时谈到北魏宗室的分裂；研究孝武帝时注意其西逃的影响；研究东魏北齐史，从两都体制的弊端着手；研究西魏北周史时注意兵种的变化等。这些方面都有一些新的见解，希望引起学界的讨论。

自然作为北朝史初学者的习作，此书的不足是明显的。由于对社会学、民族学、民族史知识的缺乏，对于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知识积累的不足，理论素养、考证功力的欠缺，所以从整体看缺乏系统性，从具体的论证看有时显得乏力。因此，还是希望听到前辈或同仁的批评意见，以便于提高论文的水平和本人的研究能力。

第一章

北魏后期的北镇社会

本章所说的北魏后期特指孝文帝迁都至六镇起义之间。本章所说的北镇指北魏与游牧民族结合地带的边境诸州镇，研究的重点放在六镇地区。^① 本章的目的在于通过北镇社会与中原社会的比较、尔朱集团与北魏朝廷的比较，清理出北镇与尔朱集团的优势与缺陷，从而为探索北朝后期的历史线索理出头绪。

第一节 北镇社会的特点

六镇出身的人物是魏末六镇起义一直到唐建立这一段历史的主角。在读史书的过程中，总感到难以深入了解这一段历史。后来于六镇起义的研读中发现东西魏至唐初史的一些疑问，通过对北镇社会的研究而得到解答。六镇起义是一个大事件，很早就为学者所关注，南宋学者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四提到，“魏之亡祸，成于六镇；轻薄六镇，实自太和”。虽然是短短几句话，但是提出的问题还是比较深刻的。之后，清代学者沈垚、钱大昕对六镇的名称相互关系进行了考辨。20世纪前半叶，周一良发表《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在上篇“统治阶级内部胡族与汉族之矛盾”中他简要分析了六镇起义的原因，认为太和改制后镇民身份的低落是起义的原因。自从周一良先生从胡汉

^① 《魏书》卷九一《刘灵助传》记载传主“常去来燕恒之界，或时负贩，或复劫盗，卖术于市”。由引文可知从燕州到恒州之间的地域为一联系紧密的相对独立的经济、社会单元。

关系，镇民身份角度研究问题之后，这两个角度就成为研究六镇问题的争论焦点。1949年之后六镇起义史成为研究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之后农民起义史的研究进入低谷，六镇史的研究成果也不丰厚。在大多雷同的研究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是唐长孺、黄惠贤、马长寿。唐长孺、黄惠贤在1964年发表《试论魏末北镇镇民暴动的性质》，此文对六镇镇民的身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魏末的六镇府户不再是一个阶级，已经分化为细民和豪强两大阶级。细民在官僚豪强的压榨下生活艰难，有起义的动力，豪强失去了复除的权利也心怀不满，于是起义就一发而不可收。此文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对六镇居民的身份进行了社会学式的分析，为研究六镇史提示了新的方法。马长寿对于民族学有深厚的修养，他在《鲜卑与乌桓》中对于六镇社会的民族学分析也是创见迭出，启发很大。此外，张国安1990年发表《试论六镇鲜卑的民族融合》一文，对六镇地区的鲜卑化问题提出新见，认为六镇地区已有相当程度的汉化。作者还认为六镇鲜卑与中原汉人的冲突是地域冲突，是经济利益的冲突。在研究北朝史的倾向上，外国学者一般注重探讨北方部族对中原文化的影响，日本学者比较早地进行了北镇社会史的研究。其代表性的学者为直江直子和谷川道雄。1983年前后，直江直子发表了《北魏的地方行政制度与镇人》、《北魏的镇人》两篇文章。在第一篇文章中作者认为在北镇居民与士兵并无内地城民与土民那样的差别。在第二篇文章中作者首先研究了镇民的经济生活，认为镇人是独立经营的均田农民和牧民，北魏中期以后镇民被官吏役使，因而不能正常生产，经济因之破产，镇人于是起来反抗。直江直子还研究了乡里关系在北镇社会中的作用。日本学者谷川道雄继续就北镇社会的地缘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还研究了婚姻、友情在武川社会中的功能。在谷川看来，北镇的豪杰通过通婚、交友加强了联系，并与民众形成了支配关系，这样就形成了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模式对北朝后期及隋唐帝国都有指导意义。日本学者所关注的具体问题，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方法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是日本学者对于北朝史的解释体系，所使用的术语、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实际，值得考虑。就北镇史而言，中国学者注重胡汉问题，北镇镇民的身份制，以及北镇起义的原因、过程、影响的考论，其研究成果是本节的基础，日本学者的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对本节启发很大。本书

对北镇社会的研究与日本学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不仅探讨北镇社会与中原社会相比的优势，也探讨它的缺陷，从而说明北镇人物建立政权却融入中原文化的事。在探讨北镇的优势方面，本节所注重的是北镇社会特征，尤其是人才特征。本节所探讨的部分问题已经为前人所发明，但是为照顾整体，本节还是有所论述，可与相关研究参照，笔者并无掠美之意。

一 北镇的文化

对于北镇地区的文化类型，较早提出而且影响较大的观点是“鲜卑化”。^① 1990年，张国安提出，北镇人“汉化进程慢”，“但大多数已有不同程度的汉化”的观点。^② 在鲜卑化与汉化之间，逯耀东在《试释论汉匈间之瓯脱》一文中，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框架。所谓“瓯脱”，指两国之间的缓冲地带。逯耀东认为“瓯脱中之匈奴华化过程，前后可分两阶段，初则与汉人混居杂处，互相往来，再则因了解而仰慕农业社会之生活方式，逐渐放弃畜牧，而定居农耕，则其原有之游牧经济与社会结构解体，尽习华俗，亦变为中国人矣。”^③ 逯耀东的结论类同于“汉化”论，对此笔者尚有疑问，不过在逯耀东提供的启发性框架内，还可以继续探索。如逯耀东所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确存在着类似于“瓯脱”的中间地带，一个游牧民族和汉族农民交错杂居的地带。此地带的文化类型是否如逯耀东先生所言，经过两个阶段的融合而彻底汉化？审查自先秦到清代的历史，“瓯脱”被完全汉化尚不多见，在文化类型上与正统的中原王朝颇有距离的时期更为常见，毋宁说，在中间地带形成的是另一种新的文化类型。

北魏北镇地区的文化交流，尚处在逯耀东所说的第一阶段：游牧民族和汉人交错杂居，互相往来的阶段。六镇地区的游牧民族是否厌弃游牧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即使有汉化的迹象，也并未到

^①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很多，代表性的为陈寅恪，见《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268—300页。

^② 张国安：《试论六镇鲜卑的民族融合》，《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1期。

^③ 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90—302页。

达十六国时期前秦的水平。本节从北镇民众的信仰和汉文化程度来说明北镇地区的文化状况。

北镇民众对于佛教或者道教，或者西亚、南亚传来的其他比较成熟的宗教，到底有多大程度的信仰？由于史料缺乏，现在还难以论定，倒是有一些例子能说明部分镇民对佛教比较陌生。《北齐书·薛孤延传》：“高祖尝阅马于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前有浮图一所，高祖令延视之。延乃驰马按稍直前，未至三十步，雷光烧面，延唱杀，绕浮图走，火遂灭。延还，眉鬓及马鬃尾俱焦。高祖叹曰：‘薛孤延能与霹雳斗。’其勇决如此。”^①此例主要是体现薛孤延的勇猛无畏，但他见浮图不礼拜求助，而是挥稍唱杀击灭雷电，可见是不信仰佛教的。又《北齐书·韩贤传》：“昔汉明帝时，西域以白马负佛经送洛，因立白马寺，其经函传在此寺，形制淳朴，世以为古物，历代藏宝。贤无故斲破之，未几而死，论者或谓贤因此致祸。”^②白马寺的汉代经函，对于佛教徒来说无疑是圣物，韩贤却敢于损坏它。这就说明了他不崇信佛教。

韩贤是朔州广宁郡石门县人，薛孤延是代人，属于本书所论述的北镇范围。这两个人的行为，能否说明北镇民众对佛教的陌生态度？同时，大量的证据表明他们对于巫术、占卜却是普遍地崇信。《魏书·刘灵助传》：“刘灵助，燕郡人。师事刘弁，好阴阳占卜，而粗疏无赖，常去来燕恒之界，或时负贩，或复劫盜，卖术于市。后自代至秀容，因事尔朱荣。荣性信卜筮，灵助所占屡中，遂被亲待，为荣府功曹参军。”^③以上是尔朱荣依赖占卜的事例。其实阅读《魏书·尔朱荣传》，就会发现尔朱荣对占卜的依赖已经达到了每事必卜的程度。

《周书》卷四十七《艺术传·蒋升传》：

升性恬静，少好天文玄象之学。太祖雅信待之，常侍左右，以备顾问。大统三年，东魏将窦泰入寇，济自风陵，顿军潼关。太祖出师马牧泽。时西南有黄紫气抱日，从未至酉。太祖谓升曰：“此

^① 《北齐书》卷一九，第256页。

^② 同上书，第248页。

^③ 《魏书》卷九一，第1958页。

何祥也？”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主四季，秦之分也。今大军既出，喜气下临，必有大庆。”于是进军与窦泰战，擒之。

这是西魏丞相宇文泰在决战的现场，依靠巫术来决策战争的事例。
《北齐书》卷四十九《方伎传》：

王春，河东人。少好易占，明风角，游于赵、魏之间，飞符上天。高祖起于信都，引为馆客。

许遵，高阳人。明《易》，善筮，兼晓天文、风角、占相、逆刺，其验若神。高祖引为馆客，自言禄命不富贵，不横死，是以任性疏诞，多所犯忤，高祖常容借之。

赵辅和，清都人。少以明《易》善筮为馆客。

綦母怀文，不知何郡人。以道术事高祖。

以上几位是利用占卜、巫术为高欢服务的专家。

《北史》卷五十四《窦泰传》：

初，泰母梦风雷暴起，若有雨状，出庭观之，见电光夺目，驶雨沾洒，寤而惊汗，遂有娠。期而不产，大惧。有巫曰：“渡河湔裙，产子必易。”

《北史》卷五三《潘乐传》：

乐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贵之征，因名相贵，后始为字。

以上二例显示了巫师在民间生活中的指导作用。

总之，巫术在北镇的政治、军事以及日常生活中经常被用来决策。值得注意的是进入中原较早的鲜卑人对于巫术渐持排斥态度。《魏书·高祖纪上》记载的太和九年正月诏书云：“图谶之兴，起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

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又诸巫觋假称鬼神，妄说吉凶，及委巷诸卜非坟典所载者，严加禁断。”^① 北魏初期的皇帝大多信奉图谶占卜，这为读史者所熟知，引文所显示的是随着进入中原的日久，汉化的深入，又由于统治阶层的信奉佛教，统治者对图谶占卜失去了兴趣，从而加以禁止。根据宗教学原理，巫术比宗教缺乏理论体系。北镇地区的民众普遍依赖巫术，反映了这一地区文化的相对落后。

另一个方面，这个地区定居的生活方式，不同于游牧民族的定期迁徙，所以原有的产生于游牧民族的文化在定居之后必然会发生改变。其次，汉族移民带来的汉文化也会慢慢地渗入少数民族之中。在孝文帝改革之后，可以肯定，政府机构的公文必然用汉字来书写，所以有志于入仕就必然会主动学习汉语。大量存在的北镇官员、僚佐对于汉语应该是能读能写，至少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的。

《周书》卷一一《宇文护传》中记载了宇文护母亲阎氏的书信，其中有一段是关于宇文护早年的教育情况，“于后，吾共汝在受阳住，时元宝、菩提及汝姑儿贺兰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学。博士姓成，为人严恶，汝等四人谋欲加害。吾共汝叔母等闻之，各提其儿打之。唯盛洛无母，独不被打”。同样的事还记载于《周书》卷二〇《贺兰祥传》，“祥年十一而孤，居丧合礼。长于舅氏，特为太祖所爱。虽在戎旅，常博延儒士，教以书传”。阎氏所述之事是在尔朱荣打败葛荣，将葛荣余部迁居并州之时。可见，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宇文氏家族对后代的教育仍然是重视的。从这个事实可以推断北镇叛乱之前的宇文家族是了解并向往汉文化的。《周书》卷一四《贺拔岳传》：

岳字阿斗泥。少有大志，爱施好士。初为太学生。

《周书》卷一四《念贤传》：

念贤字盖卢。美容质，颇涉书史。为儿童时，在学中读书。

^① 《魏书》卷七上，第155页。

《周书》卷一七《梁御传》：

梁御字善通，其先安定人也。后因官北边，遂家于武川，改姓纥豆陵氏。高祖俟力提，从魏太武征讨，位至扬武将军，定阳侯。御少好学，进趋详雅。及长，更好弓马。

《周书》卷二七《梁台传》：

梁台字洛都，长池人也。
台性疏通，恕已待物。至于莅民处政，尤以仁爱为心。不过识千余字，口占书启辞意可观。

《周书》卷三〇《窦炽传》：

后魏南徙，子孙因家于代。
炽性严明，有谋略，美须髯，身长八尺二寸。少从范阳祁祈受《毛诗》、《左氏春秋》，略通大义。善骑射，膂力过人。

《北齐书》卷一八《孙腾传》：

腾少而质直，明解吏事。

《北齐书》卷二〇《慕容俨传》：

慕容俨，字恃德，清都成安人，慕容廆之后也。
俨容貌出群，衣冠甚伟，不好读书，颇学兵法，工骑射。

《北齐书》卷二五《徐远传》：

徐远，字彦遐，广宁石门人也。其先出自广平。曾祖定，为云中军将，平朔戍主，因家于朔。远少习吏事，郡辟功曹……高祖以

远闲习书计，命为丞相骑兵参军事，常征伐克济军务，深为高祖所知。

《北齐书》卷二五《王纮传》：

王纮，字师罗，太安狄那人也，为小部酋帅。父基颇读书，有智略。

纮少好弓马，善骑射，颇爱文学。性机敏，应对便捷。年十三，见扬州刺史太原郭元贞。元贞抚其背曰：“汝读何书？”对曰：“诵《孝经》。”曰：“《孝经》云何？”曰：“在上不骄，为下不乱。”元贞曰：“吾作刺史，岂其骄乎？”纮曰：“公虽不骄，君子防未萌，亦愿留意。”元贞称善。

从以上事例，可知北镇子弟求学的原因有二：其一是长辈的意志，旨在提高子弟的文化水平；其二，是为了谋求吏职而进行的专业性学习。在第一种情形下，北镇子弟本来可以得到很好的训练，但从事例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骑射的兴趣远大于对儒学的兴趣，所以只能是粗通文墨。第二种应用性的学习，其重点在于公文的拟定和会计事务，所学在文化含量上也不高。

也就是说北镇地区并非文化的荒漠，也非单纯的胡化，可以观察到北镇也是在缓慢地汉化的过程之中，但北镇地区缺乏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人物。这种人物的缺乏，无疑显示出了北镇地区在人才结构上的重大缺陷。由于缺乏严格的知识训练，北镇地区的武人大多表现得缺乏谋略，只是靠经验或者占卜来决策。这种缺陷深刻地影响了北朝后期的历史。

二 北镇地区的社会组织^①

在北魏初年，道武帝在代北地区实行离散部落、分土定居、计口受

^① 本节受到日本学者直江直子和谷川道雄的影响。直江和谷川的著作见本章第一节学术史概述及参考文献。